

弘一大师与叶为铭的友谊及道谊

曹 布 拉

(杭州师范学院 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12)

摘要: 一般认为, 1918年夏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 友朋中夏丏尊与马一浮助力最大。1998年发现的“弘一大师致叶为铭书信九通”, 证明在李叔同出家这个问题上, 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叶为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叶为铭在李叔同莅杭任教后, 即与其意气相投, 在李叔同出家前后给予多方面的帮助, 并对李叔同的出家事佛持完全肯定态度。弘一对叶为铭的助缘铭记不忘。

关键词: 李叔同; 叶为铭; 书信; 助缘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146(2002)01-0054-05

1912年至1918年, 李叔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后更名为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图画、音乐教师。李叔同在杭时, 与浙一师的同事夏丏尊、经亨颐、姜丹书等文教名流朝夕相处, 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也与时在杭州的学界耆宿常相往还, 如国学大师马一浮等, 还与西泠印社的叶为铭等交谊颇深。

本文即围绕1998年发现的弘一大师致叶为铭九通书信, 探讨李叶之间在弘一大师出家前、出家时及出家后的交往与结下的特殊情谊。

一 叶为铭其人其事

李叔同写过一篇《我在西湖出家之经过》的文章, 详细介绍了自己出家事佛的过程。

1916年, 李叔同经夏丏尊的推荐, 读了一本日本杂志上关于“断食”的文章, 决意进行“断食”。文中说:“……至于断食的地点呢? 总须先想一想, 考虑一下, 似觉总要有一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君商量。他说, 在西湖附近的地方, 有一所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点。那么, 我就问他, 既要到虎跑寺去, 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 究竟要请谁呢? 他说有一位丁

辅之, 是虎跑寺的大护法, 可以请他去说一说。于是他便写信给丁辅之代为介绍了。”[1](第八卷, P17)

李叔同在上文中还说: 他出家的“近因”, 即是这次到虎跑寺的“断食”。

李叔同到虎跑寺“断食”, 并最终于1918年七月十三日在虎跑寺出家事佛, 成为弘一大师, 固有其内在的动力, 但外在的助力, 也不可忽视。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对李叔同出家的助缘, 一向并不如何为论者重视, 研究者多把注意力放在夏丏尊、马一浮对于李叔同的影响力方面, 这自因此二人与李叔同关系密切, 交谊非同一般之故, 也因在此前尚未发现更多有关叶品三助缘的文字资料。1998年《收藏家》第3期杂志发表了洪丽娅著《弘一法师致叶为铭信札》一文, 刊登了藏于杭州文物考古所的李叔同致叶品三九通书信的照片, 这使我们感到: 如果说人生犹如一条环环相扣的链子, 那么, 在弘一大师的人生历程中, 叶品三的助缘, 也是弘一大师的人生链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我在西湖出家之经过》一文中提到的“叶品三君”, 即是西泠印社的创社四英之一叶为铭。

西泠印社是吴石潜、叶为铭、丁辅之、王福盦四人在1904年杭州西湖孤山成立的金石书画学

收稿日期: 2001-10-20

作者简介: 曹布拉(1953-), 男, 浙江省杭州市人, 杭州师范学院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级作家。

术团体。吴、叶、丁、王四人中,吴石潜与叶为铭年齿最长,皆出生于1867年,吴氏生于六月,叶氏生于十二月。四人在印学、书画、金石、收藏、诗文、著述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

叶为铭,字品三,号叶舟,又号盘新,别署铁华庵。原籍安徽徽州歙县人。由于宋宣和三年(1121)诏改“歙州”为“徽州”,州治迁于溪北新城,距旧城三里称“新州城”,故叶氏之印作与著作中,每署“新安”之地名。清顺治(1664)年间,新州叶姓一脉迁居杭州立族。叶为铭为叶姓二十世裔。他“弱冠时即嗜爱金石篆刻,尤喜作篆隶书,师从戴用柏(注:著名金石书画家戴醇士之子)。并喜集碑碣拓片及彝器款识以自娱。辑有《广印人传》十六卷、《补遗》一卷。另辑有《歙县金石志》一书”[2](P14)。

与吴石潜一样,叶为铭也是刻碑出身、艺进乎道的金石大家。叶为铭忠厚诚恳,古道热肠。西泠印社创立之初,在孤山山前建一“山川雨露图书室”,以供同人研究和集会休息之用。嗣后,印学大昌,中外印人来归者日众,于是印社上山发展,集资扩建楼馆亭阁,有观乐、四照、石室、泓洞等等。叶为铭筹划督造,竭尽全力。1929年,浙江省举办“西湖博览会”,规模极大,时间达200多天,轰动世界。杭州印学名家众多,而西湖博览会特聘叶为铭为博览会的“金石部主任”,可见其深孚雅望。

叶为铭对故乡歙县和叶氏家族怀抱深厚的情感,对发掘、继承新安文化,不遗余力。叶氏家族在清初时,曾在钱塘县西丁婆岭下建有歙县新州叶姓支族祠堂,兵乱时毁没。叶为铭在1915年秋,取出数十年积蓄,购下杭州紫城巷土地一亩六分,独力兴建歙县新州叶氏支祠。又在西湖净慈寺边建起迁杭始祖墓。他对杭州叶氏宗族中的公益事业极为热心,如兴办教育,抚孤救贫,都不肯后人。与叶为铭有过交往的陈从周先生,曾经撰文说,在“叶先生身上,我看到一位中国艺术家的美德高风:清贫、勤俭、淡泊、爱才”。[3]

叶为铭一生潜心印学,著述甚丰,有手摹之《周秦玺印谱》,有因其母60寿辰而刻的《列仙印玩》,有辑自刻印而成的《松石庐印汇》(1899)、《铁华庵印集》(1905)及《逸园印辑》(1909)。为他人辑印成谱的,如《二金蝶堂印谱》,为赵之谦传世精品之集成。他作的《西泠印社小志》,是研究西泠印社社史的宝贵资料。另外,还有《叶氏印谱存目》《金石家传略》《歙县金石志》《说文目》等,曾辑为“叶氏丛书”,先后由西泠印社出版。

叶为铭自幼起即习篆隶,又广罗历代金石。他的书法作品,以篆体为多;其治印以典雅浑厚、平实朴茂见长。他每天清晨很早起床,坐在窗前伏案治印。刻印毕,才进早餐,数十年如一日。

叶为铭待人诚恳,热情好客,每于春秋假日,简发同人,欢聚一室,谈讨篆刻书画之胜。他曾在1915年与丁辅之、王福盦一起编写过一部《西泠印社志》,分建置、掌故、人物、艺文、规则、藏弃、志余等八卷。此志成书后未及印行,因日寇陷杭后散佚。[4]

1948年8月,叶为铭以82岁高龄谢世。

在西泠印社面向里湖的石坊上,刻有叶为铭的对联:“印传东汉今犹昔,社结西冷久且长。”仰贤亭也有联曰:“涛声听东浙,印学话西冷。”

二 李叔同交往的第一个时期

叶为铭与李叔同的交往可分为初期、中期与后期三个时期。

从现存资料来看,西泠创社四英中,惟见叶为铭与弘一大师有过书信往来。

李叔同交往的初期,应是李叔同在杭州任教、创办“乐石社”、参加西泠印社这一时期,时间大约为1914年至1916年。这个时期李叔同与叶为铭的相识相交,主要是源于对印学的共同爱好。

李叔同何年何月参加西泠印社?尚不可确考。有论者认为李叔同参加西泠印社成为社员的时间当是在吴昌硕担任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以后的1915年间,林乾良的《西泠群星·弘一法师》云:“李叔同三十五岁参加西泠印社。”[2](P122)孙晓泉《李叔同与西泠印社》亦云:“一九一五年五月,李叔同与南社同人雅集于孤山西泠印社,遂加入印社为社员。”①

李叔同弱冠即研习篆刻,早年出版过《李庐印谱》[1](第七卷,P435-436)。

浙一师校长经亨颐也是一位金石爱好者。经氏约在1908年参加西泠印社,并且自认为:治印第一,画第二,书与诗又其次。[5]曾有《经颐渊金石书画合集》行世。李叔同执掌该校艺术教席后,在1914年发起组织“乐石社”,任主任。参加“乐石社”的,就有浙一师的经亨颐、夏丐尊、费龙丁等教师和部分爱好金石篆刻的学生,还有柳亚子等

① 孙氏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长,该文原载1979年《新观察》杂志收入《弘一大师全集·十卷》140-14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

南社人物。“乐石社”成立后,还编辑出版了《乐石》杂志。

李叔同的参加西泠印社,可能与叶为铭有一定关系,此可从前述洪丽娅的《弘一大师致叶为铭信札》一文中看出一点端倪。

“之一”这封书信,分作信与“哀公传”两部分,写在两张信笺上(信笺的底版上均印有“壬子浙师运动会纪念品、锻炼”的红字)。据陈星的考证,此信时间当为1915年九月三日,因其信中所言之“社友小传”“第七集”“第八集”指的当是“乐石社社友小传”和“乐石第七集”“乐石第八集”^[6](P35)。(另外,洪丽娅对这九通书信的时间先后多有误认,陈星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1期的《弘一大师交游四题》中作了更正。)对这封信,首先是要探讨李叔同为何称呼叶为铭、经亨颐为“社长”的问题。

林子青在《弘一大师传》及《弘一大师年谱》中都误以为叶为铭是西泠印社的社长。原文为:“后来,他将出家,因此把生平收藏的印章都赠送给了西泠印社,该社社长叶舟为他在社中石壁上凿了一个‘印藏’收藏并加题记,以留纪念。”^[1](第十卷, P5)“夏间以所藏印章赠与西泠印社,该社社长叶舟为凿壁度藏……”^[7](P98);由于林氏的“年谱”在弘学界影响很大,之后的许多研究文章与著作,都把叶为铭误作西泠印社的“社长”。陈星在《品茗说弘一·西泠知交》中纠正了这个错误,但针对上信中李叔同称“叶舟社长”的问题,他提出叶为铭担任过印社“荣誉职务”的一种推测。西泠印社从1904年成立后,由于创社四英都是淡泊名利的谦谦君子,他们都热心社务,互相谦让,谁也不肯出任社长,直至1913年,才推举吴昌硕为首任社长。

我认为:李叔同在这封信中称叶、经二人为“社长”,乃是西泠印社社友间的一种敬称。叶为铭是印社元老,德高望重;经亨颐入社也较李叔同为早;叶、经二人的年纪均比李叔同大,因此李叔同敬称二人为“社长”,乃“社中长者”之意。与此相仿的还有“社兄”一类的敬称。并非因此二人担任过社长或类似荣誉性职务的缘故。

其次,李叔同写这封信时,应该已经入社,并且已与叶为铭有了一段时间的交往。其时叶为铭住在西湖涌金门附近的紫城巷,也常到位于孤山的西泠印社会友。李叔同的“走谒”,是到紫城巷叶家,还是孤山西泠印社,不得而知,或许二者兼而有之。附信的“哀公传”,很可能是李叔同入社前后,叶为铭让其写一个小传作为社员个人的资料。陈星认为此“传”虽与信同一类信笺,但从笔

墨字体来看,书写时间有先后,不能依据“入世三十四年”为这封信写作的时间^[6](P38)。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在“哀公传”中李叔同讲到自己用过“名字四十余”,而他一同奉上的《乐石社社友小传》中的“李叔同条”是:“生平易名字百十数……”^[1](第七卷, P393)在一起寄达的两份小传中,所用名字的数量差距这么大,可见“哀公传”的具体写作时间,肯定要早于《乐石社社友小传》。

第三、这封信及“哀公传”专门呈交给叶为铭而不是印社中的别一位,是否因为叶为铭是李叔同的入社介绍人或联系人呢?应该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信“之二”“之三”,是李叔同在得知西泠印社正在举办金石书画展后,为了能够让学生免费观摩这个展览会,在登门拜访不遇的情况下,写信给叶,要求叶氏能够“特别许可入场”,并告以浙一师成立了“乐石社”,附上社章作为证明。叶为铭接到李叔同的这封信后,不仅许可“乐石社”的学生免费参观,还将自己的著作“印人传”与“印学丛书”赠送给李叔同。因此,李叔同在信“之三”中表示衷心的感谢。

“乐石社”成立于1914年。信“之二”中说“师校学生近组织乐石社,研究印学,刻已有十六人”。与信“之一”比较,第一、李叔同在“之二”这封信中是首次告诉叶为铭,师校也有一个研究印学的学术团体,并附上乐石社社章,以便后者对乐石社了解得更多一些。第二、这两封信显然是在乐石社成立后不久写的。其时乐石社社员仅有16人,与后来编定的《社友小传》中所列的26人相比,要少10人。显然是乐石社成立之初社员较少之故。第三、李叔同在乐石社成立后,就考虑到要让社友们参加更多的观摩交流活动,“以广眼界”。第四、也由此证明,李叔同在加入西泠印社之前,就已经与叶为铭有了较多的交往,并且深知叶为铭古道热肠,完全能够理解自己提携后进学子的一片苦心,也完全相信叶为铭一定能够让浙一师爱好金石的学生免费观摩。

上述三信,可以看作李叔同与叶为铭相识相知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李叔同孜孜于浙一师的艺术教育,叶为铭为西泠印社的发展竭尽心力,共同的艺术爱好与艺术理想以及相近的艺术家气质,把两人连在一起。朋友相交,贵在知心。李叔同与叶为铭的君子之交由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为日后叶为铭为李叔同出家的助缘,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三 李叶交往的第二个时期

1916年,李叔同在挚友夏丏尊推荐的一本日本杂志上读到介绍“断食”的文章,便生出了尝试“断食”的念头,期望通过“断食”,治愈困扰自己多年的神经衰弱症。

李叔同去与叶为铭商量“断食”的地点,这恐怕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因叶为铭世居杭州,对杭州的情况比较了解;二则因为李叔同对叶为铭有相当高的信任度,深信后者不仅能够体谅自己的想法,而且一定有办法帮助自己实现这一心愿。

李叔同在杭州任教期间,真正能够称得上心心相印的挚交好友并不很多。在校内,他与夏丏尊情谊最厚;在校外,他最佩服的是国学大师马一浮。叶为铭能够得到李叔同高度的信任,应该说两人的交谊也非比寻常。叶为铭不负所托,立刻写信转托同为西泠印社“创社四英”的丁辅之,因为后者是虎跑寺的大护法,与虎跑寺的和尚相熟。

于是,李叔同就在这年的冬季到虎跑寺断食20天。他在断食期间,近距离地观察并融入了僧侣生活,写下了很详细的“断食日志”。他感到自己通过断食,身心有了脱胎换骨似的巨大变化,犹如获得了新生。从此,他对佛教与僧侣生活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回到学校以后,他就用老子“能婴儿乎”之意别署“李婴”。并且逐渐开始阅读佛学著作,供奉佛像。“之四”“之五”这两封信,即是出家前夕的李叔同用“李婴”这个新名写给叶为铭的。

这两封信透露出的信息是:叶为铭对李叔同出家向佛的决心不仅持理解态度,而且很热心地给予实质性的支持。1917年,李叔同开始进行出家的准备工作,他把自己的油画作品送给北京美专,把自己的书画作品分赠夏丏尊、堵申甫等朋友,书籍、衣物等送给丰子恺、刘质平、李鸿梁等学生。西泠印社的宗旨是“研究金石,收藏金石”,故李叔同把自己收藏的印章、部分书画、“日本畴村人鐫丁朱白历、滨早所藏印稿、日本滨村藏六手制刻印刀”都送给西泠印社。由这两封信,还可以推测:李叔同向西泠印社赠送物品至少有三次以上,一次是以印章为主,一次是以书画为主,一次是信“之五”所说的印稿、刻印刀等。

众所周知,西泠印社把李叔同所赠之物看得很贵重,将李叔同所赠的93方印章在西泠印社石壁上凿壁度藏,即为“印藏”。

在这两封信里,还提到叶为铭曾将一位“淡云和尚”介绍给李叔同,并偕同李叔同一起去拜谒这位高僧。这不仅说明叶为铭对李叔同出家事佛这一重大选择,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帮助,还说明李叔同断食归来后,一直到出家为止的近两年时间里,通过叶为铭牵线搭桥与陪伴,与佛门中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中得到更多佛学知识的浸润。

叶为铭是一位传统知识分子,中国儒学知识分子无论出家在家,历来有尊重释道,从中汲取精神营养的传统,尤其像叶为铭这样一生居于西湖山水之间,数十年寄情于篆刻书画艺术,不求仕进闻达,平日与释道中人往还,当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此他非但不像经亨颐那样的新派知识分子,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对李叔同的出家事佛不能理解;也不像夏丏尊那样出于深厚的情感,因李叔同的出家而感到难受。在杭州的朋友中,对李叔同的出家事佛这一选择持完全肯定态度的,一位是马一浮,另一位就是叶为铭。

到了这时,李叔同出家事佛的决心已定,又有像叶为铭这样热诚的朋友助缘,因此就在1918年七月十三日正式祝发入山,成为弘一大师。

李叶二位交往的第二个时期,大约在1916—1918年。他们从艺术上惺惺相惜的朋友始,进而通过对佛学——也可以说是对人生本原意义上认识的趋同,而成为心心相印的知交。

四 李叶交往的第三个时期

弘一大师出家后,叶为铭曾多次去看望。叶氏长弘一13岁,在十分讲究长幼尊卑的时代,若不是交情深厚,一般而言,长者是不会主动去看望年幼者的。这说明,叶为铭对于弘一大师人品学问的敬重、对于弘一大师出家事佛“了生死大事”的深切理解、对于弘一大师无畏精神的钦佩,完全发于内心,不带丝毫功利色彩。而弘一大师对于叶为铭的深情厚意,也是铭记在心,多次写信给后者,表达了自己衷心的感谢。

信“之七”,是弘一大师1918年七月十三日在大慈山虎跑寺披剃后写给叶为铭的。显然他认为自己能成就这样一个重大的人生转折,叶为铭的“介绍之劳”,是一个重要的因缘,因此怀着庄严的心情,向朋友郑重通报这一消息,并真诚地感谢朋友的帮助。

而信“之六”,当是写于1920年六月二十五日。这一年,弘一大师要到富阳新城(今新登)贝山掩关。他在这年六月手写“南无阿弥陀佛”,并

在题记中说：“庚申六月将之新城贝山掩关念佛”。友人马一浮、范古农、夏丏尊、堵申甫、李鸿梁等在虎跑寺下院为弘一大师治面办斋饯行，并摄影留念。弘一大师临行前，书魏碑体两大字“珍重”，赠送给夏丏尊，并跋云：“余居杭九年，与夏丏尊交最笃。今将如新城掩关，来日茫茫，未知何时再面？书以贻，感慨系之矣。”[7] (P111)

弘一大师选择七月十三日掩关，是为纪念自己出家两周年，掩关之后，谢绝人事，何时出关，没有期限。因此要向朋友们一一告别。弘一大师一直认为，叶为铭对他的出家修道有“介绍之劳”，故特别作书表示感谢。而且在这封信中，也可看出，在1920年的春天，叶为铭曾去看望过他，并带去了竹笋等时鲜蔬菜。弘一大师原定六月二十日到新城贝山寺掩关，由于房屋修修停停，一时不能竣工入居，所以只好先住在楼居士的家中。在1920年六月二十五日的同一天，弘一大师还写信给夏丏尊：“丏尊居士文席：曩承远送，深感厚谊。来新居楼居士家数日，以是日音剃染二周年也。……”[1] (第八卷, P120)

弘一大师在同一天写信给夏丏尊与叶为铭，应该说是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夏丏尊是弘一大师在俗时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他出家修道的另一位有力助缘者。《我在西湖出家之经过》一文中，提到出家的“远因”，是一次与夏丏尊到湖心亭吃茶，“当时夏丏尊居士曾对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那时我听了这话，就觉得很有意思。”之后载有“断食”文章的日本杂志，是夏丏尊向弘一大师推荐的。本来，弘一大师是打算在1919年出家的。在1918年七月初，弘一大师住在虎跑，夏丏尊去看他，看到他穿着出家人的衣服，但还没有出家，就对弘一大师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服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的好。”李叔同承他的劝，“于是赶紧出家了”。[1] (第八卷, P17)

弘一大师在自己出家两周年的日子里，自然会回忆起自己出家修道的前因后果，不禁提起笔来，给夏丏尊、叶为铭这两位对自己的出家起到推动作用的朋友写信，笔下饱含感情。

1923年，叶为铭要为自己去世的父母在孤山西泠印社建塔回向，请弘一大师书写塔上的阿弥陀

陀经。信“之八”“之九”，讲的都是这件事。

弘一大师出家后，诸艺皆舍，惟书法听从范古农之言可以写经结缘，因此在出家以后，不间断地书写经文佛号，送给有缘之人。对于叶为铭这位老朋友的要求，弘一大师欣然从命。于是，就有了镌刻在西泠印社汉三老室后的阿弥陀佛经塔上的经文。这篇“阿弥陀经”，为笔划极其工整端秀的小楷。

一般书法名家的作品中，应酬之作多不是精心创作的精品。而弘一大师无论在俗还是出家后，对于写字始终是极其认真，倾注着自己的全部心力。从这两信上都可以看出，他是把这篇佛经当作一件完整的艺术品来对待的，因此谆谆嘱咐，“网格线”要照刻，刻的时候，“刀法宜浑圆，不可有锋棱”；又关照：叫匠人装裱时，注意保持纸面的整洁，不要污损。好在叶为铭本来就是刻碑出身，由他监造的阿弥陀佛经塔上的经文，完全按照弘一大师嘱咐的样式，网格线照刻，每字都一丝不苟，充分体现弘一书法的神韵。大约弘一对自己的这件书作也很满意，因此要求叶为铭“希惠拓本若干份，广结善缘”。

如果说李叶相交的第一时期是“以艺术交”，第二时期是“以道义交”，那么这第三时期即是“以艺术道义交”。世间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有很多种类型，有的是因为亲情血缘之关系，有的是因为利害之联结，有的是因为志趣相类似，等等，而像弘一大师与叶为铭之间以“艺术道义”相一致而结下的君子之交，当是永远值得后人敬慕的崇高境界。

参考文献：

- [1] 林子青. 弘一大师全集[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 [2] 林乾良. 西泠群星[M]. 杭州: 西泠印社, 2000.
- [3] 陈从周. 叶品三先生谈往[A]. 朱妙根. 西泠往事[C]. 杭州: 西泠印社, 2000. 102.
- [4] 朱妙根. 闲寻绿格传孤本[A]. 朱妙根. 西泠往事[C]. 杭州: 西泠印社, 2000. 293-294.
- [5] 董舒林. 西泠印社与经亨颐[A]. 朱妙根. 西泠往事[C]. 杭州: 西泠印社, 2000. 39-42.
- [6] 陈星. 品茗说弘一[M]. 杭州: 西泠印社, 2001.
- [7] 林子青. 弘一大师年谱[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5.

(下转第97页)

除了分化重组之外,高校学报还应该利用多种现代化媒介手段,建立起走在时代前列的活泼形象,大力促进学术信息的流通和应用。如今,互连网络对传统媒体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其优势已经无须辩论。网络环境下,学报在走向专业化、出版专业印刷刊物的同时,应该充分利用网络,同步出版电子期刊,逐渐建立容量更大功能更多的相关专业网站和数据库。依托专业刊物,组织专业力量,及时发布学术最新信息,充实网络内容,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方法。网络多媒体的应用可以促进学术信息表达手段多样化,不再受印刷媒介的制约,使学术信息更丰富、更精确、更有表现力。同时,建立专业网站和数据库可以打破学报检索困难和传统媒介单向性传播的缺陷,促进学术群体与企业管理群体等社会各阶层的直接多向互动,把传播过程中的噪音障碍减小到最低程度,使网络真正为信息的快速流通和应用转化服务,有

力地促进知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法规制度的健全,这一方案并不难做到。

参考文献:

-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 [2] 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 [3] 邹惠卿.论大学学报的性质、特征及其功能[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
- [4] 大学在新经济中何去何从[N].参考消息,2001-06-05.
- [5] 迈克尔·辛格尔特里.大众传播研究:现代方法与应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 [6] 孙义清.高校学报发展理念及战略构想[J].编辑之友,2001,(3).
- [7] 郑素侠,向飒.强化特色和优势,重塑学报形象——对集约化办刊的构想[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1).
- [8] 刘少华.高校合并与学报走向[J].编辑之友,2001,(1).

On the Dilemma and Reformation of the College/University Journal from the Dissemination Study Perspective

SHEN Song-hua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As a medium of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academic interchange, the college/university journal must follow dissemination rules, be open to the audience and facilitate the wide sharing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But currently many journals ignore the dissemination property in their editing, become isolated from the audience and separated from the society. Meanwhile, the organizational dissemination property of the journal placement system prevents its norm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the journal must be reformed, be restructured, be raised in its academic dissemination quality with the adoption of various modern media, and contribute to the information age.

Key Words: journal; dissemination; medium; audience

(责任编辑:朱晓江)

(上接第58页)

The Friendship and Comradeship between Master Hong Yi and Ye Wei-min

CAO Bu-la

(Research centre of Master Hong Yi-Feng Zi-kai,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It's agreed that Li Shu-tong's best friends are Xia Mian-zun and Ma Yi-fu, when Li became a monk at Hu Pao temple of Hangzhou in 1918. "The Nine Letters from Master Hong Yi to Ye Wei-min", as discovered in 1998, best certifies that the founder of the Xi-ling Engraving Society—Ye Wei-min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Li Shu-tong's becoming a monk. As soon as he began to teach in Hangzhou, Ye hit it off with Li, gave Li much help in becoming a monk and thought positively about it. Hong Yi had been indebted to Ye for the help luck ever since.

Key Words: Li Shu-tong; Ye Wei-min; letters; help luck

(责任编辑:朱晓江)